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说服君主

——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

● 黄鸣奋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黄鸣奋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5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ISBN 7-5039-2029-7

I. 说… II. 黄… III. 传播 - 文化史 - 研究 - 中国 - 古代 IV. G21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903 号

说 服 君 主

——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

作 者: 黄鸣奋

责任编辑: 帅雯霖

装帧设计: 姿态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ww.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29-7/J·609

定 价: 54.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总序

郑学檬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自1993年初议,1995年正式立项、1999—2000年首批书稿完成,历时8年,其间海峡两岸三地的相关学者,多次切磋,共商大计,筚路蓝缕,终成弘绩。回首往事,虽叹岁月之易逝,然亦有感于有志者事竟成也。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计划的酝酿和形成。

1993年在余也鲁、徐佳士、孙旭培、郑松锬等海峡两岸三地传播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在厦门大学举行了“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这是一次研究“传播学中国化”问题的重要会议。由于出席者中不少是当时两岸三地新闻传播学界的有代表性的知名学者,并且会议的主题“‘传播学中国化’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探索中国传播观念理论和实践”十分醒目鲜明,所以,会上纲举目张,很快形成共识。会议论文结集收在《从零开始》一书中,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1994年印行。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收获,就是议定出版一部概论性著作,就27个与中国传播有关的选题,向海峡两岸征稿,并请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先生玉主其事,反应至为热烈,不少学者、学子报名参加,结果是《华夏传播论》的编成,由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共识既已形成,跨学科的开创性探索也已开辟新途,“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遂于1995年正式形成方案,通过《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物,向国内新闻传播和文史学者招标。先后两次立项,计五史六论,11个项目。

这个资助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学者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并整理出已有的传播思想,建立中国传播理论,促进“传播研究中国化”,从而丰富人们对传的行为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考方法。

无疑,这个项目非常有学术意义。“传播研究中国化”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这就是引进吸收国外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调查研究中国当代的传播现状和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三者必须鼎立,否则整个“传播研究中国化”工作就会倾斜。“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支持其中较为薄弱却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学术上的意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这个项目不仅很有学术意义,还很有时代意义。它企图打通这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两个热点:中国传统文化和信息时代。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世界格局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中华文化圈的崛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也就倍受世界的关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之一。我们的时代又

是一个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信息传播自然属性的当代信息科学,已成了时代的热点,而研究信息传播社会属性的传播学,也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势必成为这个时代的热点。“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抓住这两个热点,并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其时代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正因为“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具有上述的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它受到热烈的反应和广泛的支持、参与。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进展。

根据多次磋商,我们确定“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选题范围包括以下 12 个领域:

1) 中国传播文化中有关传的起源、特性、作用与概念(侧重古代文化与洞穴文明的探索)。

2) 符号、媒介与传播包括语言、文字、非语言传播。

3) 环境与传播,包括自然环境、人工建设(例如运河、长城)及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传播的影响。

4) 政治传播,包括政治设施、变法维新及朝野之间传通的作用和影响。

5) 思想与文化传播,例如百家争鸣,西学东渐,文学创作与翻译、教育与教化。

6) 经济传播,例如农耕技术、商业信息、货币流通等影响。

7) 民间传播,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传播等渠道的研究。

8) 说服传播,包括合纵连横等论辩术与说服技巧的研究。

9)中国人际传播的特色,从道德修养到人体语言。

10)传播体制的研究,包括信息的储存、传递和控制。

11)中外信息交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包括佛经、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及西方宗教与思想的传入。

12)古代新发明与新思想诞生的过程、阻力及限制。(火药、活字印刷、历法、天文仪等古代早已发明,但没有得到发展的空间,直到明清西风东渐,中国才享受到“文明回流”的成果)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项目设计是宏观的、全方位的,它广纳百川,延揽各方学者参与。经过数年努力,11位学者参与的“五史六论”的11个项目,将陆续付梓。可以说《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进展情况是值得高兴的,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样一个深远的研究项目,是由余也鲁教授发起,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组织实施,并得到了香港海天基金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及联合基金会的资助,玉成其事。在此,我代表丛书编委会向余先生和上述单位致以衷心感谢。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委员会

- 余也鲁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徐佳士教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原文理学院院长）
郑学檬教授（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名誉所长）
孙旭培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陈培爱教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新闻传播系主任）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编委会

- 主 编：郑学檬
编 委：余也鲁 徐佳士 郑学檬 孙旭培 陈培爱
协调人：黄星民
主 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

目 录

序言:讽谏传播流变	(1)
一、 讽谏的涵义	(2)
二、 讽谏的演变	(13)
三、 讽谏的研究	(37)
 第一章 讽谏传播主体	(53)
第一节 讽谏传播主体的人格特征	(53)
第二节 讽谏传播主体的角色设置	(59)
第三节 讽谏传播主体的自我意识	(67)

第二章	讽谏传播手段	(79)
第一节	讽谏传播中的潜语运用	(79)
第二节	讽谏传播中的语言运用	(84)
第三节	讽谏传播中的物语运用	(96)
第三章	讽谏传播方式	(105)
第一节	求谏方式	(106)
第二节	进谏方式	(113)
第三节	应谏方式	(124)
第四章	讽谏传播对象	(131)
第一节	听谏之益	(131)
第二节	纳谏之难	(136)
第三节	制谏之律	(141)
第五章	讽谏传播内容	(150)
第一节	讽谏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150)
第二节	讽谏传播内容的规范性	(157)
第三节	讽谏传播内容的艺术性	(163)

第六章 讽谏传播环境	(169)
第一节 讽谏传播的史乘背景	(170)
第二节 讽谏传播的宫廷背景	(174)
第三节 讽谏传播的家族背景	(179)
 余论:讽谏传播启示	 (187)
一、 关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	(187)
二、 关于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	(203)
三、 关于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	(214)
 附录:讽谏传播个案(晏子研究)	 (222)
一、 讽谏传播:主体与对象	(224)
二、 讽谏传播:手段与内容	(238)
三、 讽谏传播:方式与环境	(254)

序言：讽谏传播流变

如果以“张力”为标准来衡量传播情境的话,那么,古代的“讽谏”也许是相当惊心动魄的:一方是天子、君主,手握权柄,言出法随;另一方是臣属、民众,尽管在统计学意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在具体情境中却常处于绝对的劣势,其生死都操纵在喜怒无常的君主、天子手中。进谏的基本手段,通常只不过是软弱的舌头或笔头,但是,所要议论的内容却是朝政,是国家大事,殆所谓系千钧于一发。言语的力量及弱点,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了:一句应对,可以讨得君主的欢心,也可以招来杀身之横祸;一片谏草,可以匡救时弊,博得千古美名,也可以祸国殃民,将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因果链条上起作用的,既有瞬息间的机巧权变,亦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环境因素与力量对比。时至今日,不论是当年进谏的士大夫,或者是纳谏、拒谏的君主,都早已作古,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却为传播史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课题。现代传播学所肩负的任务之一是把握说服的规律,中国古代的讽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阐明这一规律提供了借鉴。在本书中,我们将首先探讨古代“讽谏”的涵义,追溯讽谏的历史发展,介绍相关研究的设想。

一、讽谏的涵义

古代有着重视“正名”的传统,我们对讽谏的探讨也从“正名”入手。这当然不是为了维护某种由旧时代的礼制所规定的名分,而只是为本书的内容界定相应的外延和内涵。

(一) 讽谏的语义

要弄清讽谏的涵义,得从一般意义上的“谏”入手,进而了解“讽”的内涵,以及作为合成词的“讽谏”的由来。

1、“谏”

根据通常的理解,“谏”指直言规劝,多用以下对上。《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①《墨子·非儒下》:“务善则美,有过则谏。”^②由此看来,谏的基本要求,是从礼义(相当于礼制和道德之精神)出发,对于他人(多指君主)的过失加以指正。与“谏”通而略异的有“诤”,其义为直言规劝,止人之失。汉刘向《说苑·臣术》:“君有过失而不谏诤,将危国家、殒社稷也。有能尽言于君,用则

① 《周礼》卷十四,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缩印版《十三经注疏》,第 731 页上。

② 《墨子》卷九,孙诒让间诂本,上海书店排印版,第 182 页。

留,不用则去,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① 由此看来,“谏”、“诤”都力图纠正君主的过错,但若不成功,谏者仅限于离开君主、另谋出路,诤臣则以死了结(可能是自杀,但也可能因其言辞激烈、态度执着而被杀),这是二者的差别之所在。“诤”常与“谏”连言,如《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所载《圣主得贤臣颂》:“及其遇明君遭圣主也,运筹合上意,谏诤即见听。”^② “诤臣”指直言谏诤之臣,如《孝经》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③ 白居易《长庆集》卷四《采诗官》诗称:“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④ 至于“诤友”,则可指敢于直言规劝的朋友。与“谏”有本质区别的是“讪”,即毁谤、讥刺。前者是善意的,后者则是恶意的。《礼记·少仪》:“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⑤ 《论语·阳货》:“恶居下流而讪上者。”^⑥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古人对讪所持的否定态度。

2、“讽”

“讽”的涵义主要有二:一是背诵,二是用委婉的语言暗

① 刘向《说苑》卷二,赵善治疏证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2 月版,第 53 页。

② 《汉书》卷六四下,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版,第 2826 页。

③ 班固《白虎通》卷五《谏诤》引,陈立疏证本,中华书局 1994 年 8 月版,第 226 页。今本《孝经》卷七《谏诤》作“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缩印版《十三经注疏》,总第 2558 页。

④ 《白居易集》卷四,中华书局 1979 年 10 月版,第 90 页。

⑤ 《礼记》卷三五,孔颖达正义本,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缩印版《十三经注疏》,总第 1512 页下。

⑥ 《论语》卷一七,何晏等注,邢昺疏,中华书局 1980 年 9 月缩印版《十三经注疏》,总第 2526 页下。

示、劝告或讥刺、指责。《荀子·大略》：“少不讽，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杨倞注：“讽谓就学讽《诗》、《书》也。”这是就第一义而言。^①能背诵诗书，说话往往就不会那么直来直去，因此，“讽”的第一义和第二义是有所关联的。《韩非子·八经》：“故使之讽，讽定而怒。”王先慎集解：“讽，谏也。”^②陈奇猷集释：“不以正言谓之讽。”^③这是就第二义而言。相关的词语有“讽喻”（又作“讽喻”），指用委婉的话进行劝说。班固《两都赋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④《三国志·吴书·阚泽传》：“（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⑤以上二例，都用了“讽喻”一词。在教育、感化的意义上，“讽”通“风”。《淮南子·主术》：“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⑥《汉书·叙传下》：“贾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风议，博我以文。”颜师古注：“风读曰讽。”^⑦因此，“风议”解作讽谏议论。《汉书》卷七六《赵广汉传》“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先闻知，风谕不改，乃收捕之”注：

① 《荀子》，王先谦集解本，上海书店 1986 年 7 月影印版《诸子集成》，第 335 页。

② 《韩非子》，王先慎集解本，上海书店 1986 年 7 月影印版《诸子集成》，第 331 页。

③ 《韩非子》，陈奇猷校注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7 月新 1 版，第 1003 页。

④ 见《文选》卷一，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影印版，第 21 页。

⑤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 1982 年 7 月第 2 版，第 1249 页。

⑥ 《淮南子》，高诱注本，上海书店 1986 年 7 月影印版《诸子集成》，第 130 页。

⑦ 《汉书》卷一〇〇，中华书局 1962 年 6 月版，第 4249—4250 页。

“风读曰讽。”^①由此,“风谕”同于“讽谕”。类似的词语有“讽刺”,指以婉言隐语讥刺人。本作“风刺”。《诗·周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②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③但“风”的意义远较“讽”为多。即使在教育、感化的意义上,二者也略有差别。“讽”较多用于下对上,“风”则较多用在上对下,因此颜之推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④值得注意的是:由“讽”所组成的复合词并不一定是褒义的,像“讽旨”、“讽解”等就是如此。《后汉书·宦者传·蔡伦》:“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同书《西羌传·滇良》:“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⑤以上二例中,“讽旨”都和不正当的行为有关。诸葛亮《正议》说:“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⑥“讽解”意为讥讽离间,在上例中也是否定性的。

3、“讽谏”

《文选》扬雄《甘泉赋》“奏甘泉赋以讽”注:“不敢正言,谓

① 《汉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3201页。

② 《毛诗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9月缩印版《十三经注疏》,总第271页中。

③ 《文心雕龙》,周振甫注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80页。

④ 《颜氏家训·治家》,上海书店1986年7月影印版《诸子集成》,第4页。

⑤ 《后汉书》卷七八、八七,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514、2878页。

⑥ 《诸葛亮集》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第14页。

之讽。”^① 正言与否,是“谏”与“讽”的差别之所在。相比之下,“讽”通常指的是在发现君父有过失而又难于正面指摘时,或托兴诗赋以见于辞,或假托事以陈其意,冀有所悟而迁于善;“谏”则是在觉察到事有不善时,指陈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论之不疑,必有所益。大致而论,讽重在微言相感,谏重在直言相劝。“讽”、“谏”连言,产生了新概念“讽谏”。例如,《史记·滑稽列传》称:“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太史公自序》说:“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② 汉代韦孟有《讽谏诗》之作。

不论是“讽”、“谏”抑或“讽谏”,都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大致而论,当“讽”与“谏”对举时,“讽”是微言相感,“谏”是直言规劝,二者都属于说服传播,但有婉、直之分;当“讽”与“谏”连言时,可能重在“讽”,指一种特殊类型的“谏”(“五谏”之一,详下),也可能重在“谏”,泛指一切形式的进谏。因此,我们说“讽谏”有广狭二义。

(二) 讽谏的特征

不论是广义讽谏或者狭义讽谏,都是一种传播。笔者在《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六要素”原理,将统一的传播情境分解为相互关联的六个成分,即传播主体、传播手段、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传播内容和传播环境。^③ 运用上述原理

① 萧统编《文选》卷七,李善注本,中华书局 1977 年 11 月影印版,第 111 页下。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六、一三〇,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3200、3314 页。

③ 详见拙著《传播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第 28—30 页。

来考察讽谏(狭义),可以发现它的三大特点,即卑为尊言、直理曲说与节情适变。

1、卑为尊言

讽谏主体的地位之卑,与讽谏对象的地位之尊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讽谏”作为一种“谏”所固有的特点。汉代贾山曾指出:君主的威势超过万钧雷霆,给臣下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即使君主和颜悦色地表示愿意听取意见,臣下仍然战战兢兢不敢把话说透。若遇上暴君,臣下就更为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即使有错也听不到批评,听不到批评便难以发觉自己的过失,这样,国家就危险了。^① 卑为尊言,本就不易;何况这“尊”不是一般的“尊”,而是“万乘之尊”;这“卑”,也不是一般的“卑”,而是时时刻刻意识到“臣惶诚惶恐死罪死罪”的“卑”。因此,“讽谏其难,难于上青天!”

正因为讽谏是“卑为尊言”,我们在古代留下来的有关资料中经常可以发现诸如“伏惟”、“臣愚以为”、“愧惧交深”之类自谦性的套语,以及“天恩”、“圣躬”等表示对君主之敬意的文字。当然,我们肯定讽谏的上述特点,并非否定尊卑关系、君臣关系的可变量性,只不过是说:当君不复为君、臣不复为臣时,讽谏也不再是讽谏。尊者陵夷,卑者崛起,这在历史上确实不是罕见之事,但惟有“卑为尊言”才属于讽谏。

^① 贾山《至言》:“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靡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失矣;弗闻,则社稷危矣。”《汉书》卷五一本传载,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024页。